

漢唐時期中國佛教史簡介

（參看附件：《漢唐時期中國佛教諸宗祖師及大事簡介》）

二．鳩摩羅什大師至玄奘大師之間

公元 401 年，鳩摩羅什大師輾轉來到長安，在長安的十幾年裡，羅什大師給中國帶來了般若和中觀理論，對中國佛教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，使得佛教漸漸回到了它本來的樣子。

在鳩摩羅什與玄奘大師之間的兩百五十年裡，是佛教在中國發展的核心階段，佛教事業非常繁榮，人才輩出影響深遠，宗派理論紛紛建立。

這裡面有來自佛教理論本身的魅力，它吸引了當時眾多的文化精英投身其中，而同時也有歷史的原因。三國之後至隋唐時代，中國的北方多被外族統治，社會動蕩，這些來自北方大漠或者來自草原的統治者，文化並不發達，為了對付漢地發達的文化，必須要選擇一種新的文化形式作為核心，佛教也正是這些民族的主要信仰，於是自然成為主流的宗教力量。

任何思想如果沒有政府護持和推廣，很難遍地開花世代傳承，佛教也不例外。仔細看看那時期的祖師大德，很多人和皇家有著密切的關聯。許多大德甚至為了佛教的紮根和發展，委曲求全迎合皇室。

淨土宗的慧遠大師是道安法師的弟子，他和鳩摩羅什大師是同時代的人，兩個人有過書信往來，針對不少大乘思想的核心問題進行過探討。羅什大師對慧遠大師非常贊嘆，這當然和慧遠大師的修為成就有直接的關係，但是也能看出中國的儒家和道家思想與佛教的修為成就非常貼近，受過儒家道家思想熏陶的行者，走入佛教是非常容易的，並且起點也相當高。

甚至有人說，佛教傳入中國之後，中國再沒有出現過春秋戰國時代的那些聲名顯赫的思想家，究其原因就是中土的那些佼佼者，都投身到了佛教，反而使中國自己的本土文化傳承顯得後繼乏人。

這話相當有道理，要理順中國思想史、哲學史、文化史、社會史，都不能繞開漢唐時期佛教傳入中國，給中國帶來的文化影響。那時候很多人不但投身佛教，並且以能夠到達遙遠的印度，獲得完整的原本佛教經典，親歷佛陀的故土為難得的人生經歷。有些人甚至為了這個目標，歷盡千辛萬苦，乃至搭上了寶貴的生命。

法顯正是西行取經隊伍中的一員。

他和羅什大師、慧遠師是同時代的人，三個人是同一年出生，法顯年逾花甲動身西行，回到中土已年近八十歲。他的《佛國記》記載了他到過的三十幾個國家，雖然和兩百年之後玄奘大師留下的《大唐西域記》記錄的一百三十幾個國家相比，顯得沒那麼詳細和豐富，但是同樣給後來研究印度歷史、地理和社會狀況的學者留下了重要的依據。這本書和玄奘大師的《大唐西域記》成為十九世紀的考古學家們研究印度歷史的重要依據。

公元 408 年，佛馱跋陀羅尊者到了長安，見到了鳩摩羅什大師。

尊者來自佛陀的故鄉，北印度的迦毗羅衛，是釋迦族的後裔。尊者和羅什大師最初相處得很融洽，但是後來卻相當不愉快，比起今天的門派之爭，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。尊者到長安之後的第三年，也就是公元 411 年，不得不離開了長安。史書記載相當曲折悲壯。

兩年之後的 413 年，羅什大師圓寂。

普遍認為二人雖同是禪者，但是道風各異，羅什大師宗龍樹菩薩大乘空宗思想，而佛馱跋陀羅謹守上座部規範。究竟如何？從今天來看，也許另有解讀。尊者後來得到廬山慧遠大師的護持，一番遊歷之後，於 425 年翻譯出了六十卷本《華嚴經》，影響深遠。《華嚴經》雖是龍樹菩薩集結，但屬大乘有宗，以此揣摩，尊者和羅什大師之間的知見隔膜，當屬空有之爭也未可知。而且當時，羅什大師的空宗思想甚是興隆，深受中國道家出世思想熏陶下的行者們的青睞，而有宗思想尚未成型，被當時乃至後來人誤解為道風差異，不足為怪。從史料記載來看，羅什大師的弟子們對於尊者的態度，完全不象是道風差異上的問題，個中實意值得深究。

禪宗初祖菩提達摩公元 520 前後到中國，其所傳禪法依《楞伽經》而立，而此經正是有宗禪法所必須。達摩祖師駐錫當時的少林寺，亦被修習止觀禪法的僧眾看作是外道而遭默擯，遂面壁九年，沒有徒眾。

這時候距離羅什大師的圓寂，已經過去了一百多年。而達摩大師和佛駄跋陀羅兩位大師間隔百年，而遭遇類似，很值得玩味。

雖然慧遠大師與《華嚴經》深有淵源，但卻並沒有看到這一部六十卷《華嚴經》。羅什大師翻譯了龍樹菩薩的《十住毗婆沙論》正是《華嚴經》《十地品》的註解，但是大師是否見到了足本的《華嚴經》，從史料看，也甚是可疑。應該有理由相信，羅什大師帶來的龍樹菩薩大乘空宗思想，深得中土道家思想下的行者們的接納，而這些行者，對於有宗的理論乃至禪法，還不很適應。

雖然在佛陀的教義中，有宗的思想早已有之，但是直到公元 400 年到 500 年，瑜伽行派的有宗的思想體系才逐漸成熟，其核心人物就是無著和天親兩位菩薩。瑜伽行派思想體系比龍樹菩薩的中觀思想晚了兩百多年，而前者直到玄奘大師西行取經回到長安，才得以完整地進入中國。而這已經是公元 643 年之後的事情。

在此之前的幾百年時間裡，中觀思想成為中國佛教各個宗派思想的主要依從，一點也不奇怪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天親菩薩的《往生論》進入中國的時間並不晚，曇鸞大師給這部論做了註疏，影響了整個淨土宗。從那個禪宗與般若中觀為主流思想的年代來看，曇鸞大師的著述是基於空宗的淨土還是基於有宗的淨土，倒是值得再做探討。

空有之爭直到現在溫度還很高。但是正如玄奘大師所說，聖人設教無不通達，爭論是因為行者本身智慧微淺。時代不同，教法本身所針對的眾生根基也不相同，所要完成的目標也不相同。般若中觀時代，佛教的理論已經建立起解脫道行法次第，而之後行者需要從自性地成就中生起法界莊嚴萬有，描述法界無盡緣起的《華嚴經》，正是龍樹菩薩時代最偉大的集結。從

天親菩薩的華嚴經《十地經論》可以看到瑜伽行派的宗旨，是針對空宗自性法圓滿之後生起萬有法界的補充。瑜伽行派的成就必須基於般若中觀的建立才得以圓滿。

瑜伽行派的理論系統中關於八識運作法相生起，論述得非常詳細，站在華嚴經教義系統上看，正是十回向位乃至十地位以後的相應成就。只是華嚴經中龍樹菩薩時代的表達模式，和世親菩薩時代的瑜伽行派的理論構建方法不同。華嚴經《世界成就品》和《華藏世界品》，以無量的香水海香水河來描述層層無盡的法界生起，而在法相唯識理論中，境界相的生起，正是無量種子的成熟顯相。

後來的行者怎麼看，各有各的理由和依據，這裡不再多說。但是從凡夫的邏輯看，一個究竟的般若空宗系統已經建立了兩百年之後，再需要來一個不那麼究竟的瑜伽行派的有宗，應該不合情理。

羅什大師翻譯的《法華經》和北涼曇無讖翻譯的《大般涅槃經》幾乎是同一個時代，這兩部經深深影響了後來的中國佛教。羅什大師圓寂之後，大師的兩位弟子慧觀和慧嚴，同謝靈運一起對《大般涅槃經》進行了整理，才有了現在的 36 卷南本和 40 卷北本之分。

公元 500 年之後，禪宗在中國開始發展，而淨土宗雖然由廬山慧遠大師開始創立，其理論體系，直到唐朝善導大師時代才真正確立。善導大師與慧遠大師之間相差了兩百多年。

從宗教的角度看，禪宗和淨土宗是佛教中最民間化的兩個宗派，一個主張頓成，一個行法簡單，這兩點都深得中土大眾的喜愛。直到今日，禪宗和淨土宗，依然是中國最活躍的兩個宗派。

一般的大眾都希望用最省力最省時的方法得到來生的保證，至於是不是原本的佛教，並不是他們關心的事。

菩提達摩是中土禪宗的初祖，但是在此之前，坐禪作為行法，在中國應該是存在的。菩提達摩到中國的時候已經是公元 500 以後的事情，距離安世高大師譯經，有三百多年的時間，距離鳩摩羅什到長安，也已經過去了一

百多年。禪宗的建立，與性宗思想的成熟有直接的關係，頓悟成佛不歷時劫的理論思想，加上一闡提皆可成佛的經典依據，對於修行者來說非常有誘惑力。禪宗徹底影響了整個中國文化的走向，特別是六祖慧能大師之後的禪宗，似乎更是徹底擺脫了學究氣。

公元五百年末，隋朝一統天下，結束了中國三四百年的分裂狀態。六百年初，唐帝國建立，李氏家族建立起一個統一而強大的國家，百姓安居樂業，各行各業蓬勃發展，長安成為文化中心。佛教在國家的護持下，發展迅速，越來越多的經論傳入中國，各宗各派思想趨於成熟。

可以說，隋唐之後中國文化的各個方面，都可以見到佛教的影子。佛教成為了中國文化的核心。其豐富的經典著述和眾多的漢地高僧大德，比起中國本土的儒家道家系統，都有所勝出。

隋代和唐初時期主要的佛教宗派，包括禪宗、地論宗、攝論宗、天臺宗、華嚴宗、淨土宗、法相宗等等，相當壯觀。而在此之前，各自的思想還相當單薄，只能稱之為思想流派，尚不能稱為宗派。

法華經的圓教思想並非初始於天臺智者大師，它可以追溯到鳩摩羅什大師那個時代，但是智者大師的理論體系中，還融合了當時淨影師和嘉祥師的思想，這兩位大師都是當時佛教思想的集大成者。天臺家思想不論在當時還是在後來，對中國佛教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特別是智者大師藏通別圓判教理論，融各家之思想，直到今天還是中國佛教理論的核心構架。

這當然與《法華經》和《大般涅槃經》的圓教地位有重要關係。

而差不多同一個時期到中國的《華嚴經》，因為嚴重缺文，在當時，其作用遠不如這兩部經意義深遠。直到華嚴宗思想建立，和八十卷華嚴經傳到中國，這部經才被擺到了顯赫的位置。

站在今天的立場來設想，如果八十卷本華嚴經能和羅什大師一同來華，並且得到應有的解讀，中國各個宗派的思想體系會不會與今天的不同呢！很不好說！

公元六百年前後，杜順和尚提出華嚴宗思想的雛形，其一是判教思想，其二是十玄門理論。之後的智儼大師、賢首大師和清涼大師，都是在此思想的基礎上來建立完整的華嚴宗理論。其他的宗派，幾乎都是在第二祖、第三祖時期，宗派理論才得以清晰，而華嚴宗應該是很特別的一宗，初祖即奠定了理論脈絡。

唐初 627 年，玄奘大師西行取經，遊歷印度十幾年，於公元 643 年返回長安，帶回了法相唯識宗的諸多經典，直到 664 年圓寂，玄奘大師一共翻譯了 75 部經論，一千三百多卷。雖然大師的譯經院規模不如羅什大師那個時代，但是玄奘大師的譯經程序和嚴謹的譯經規則，卻超過了古人。

玄奘大師的《大唐西域記》記錄了大師西行的見聞，以及在印度時期的求學經歷和佛學成就。

華嚴宗的思想到清涼大師時代達到了頂峰，這和八十卷本華嚴經的到來關係密切。清涼大師參與了四十卷華嚴經的翻譯，這對華嚴宗的思想完善提供了很大的輔助作用。這部經份量上雖然比不上玄奘大師翻譯的六百卷大般若經，但是其結構確實是佛教中最復雜的，遠遠超過任何一部經典。

（待續）